

● 中国：发展与改革系列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编

艰 难 的 探 索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艰 难 的 探 索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亚夫
责任校对 赵毅
技术设计 王铮

艰 难 的 探 索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1/32 12·875印张 278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80025-013-X/F·11

统一书号：4361·76 定价：3.00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赴匈、南考察人员名单

团长	高尚全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副团长	陈一谾	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副团长	王小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局长
秘书长	李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科研处处长
团员	张少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团员	赵榆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
团员	崔鹤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团员	高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室副主任
团员	白南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学室副主任
团员	刘泽鹏	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
团员	郑洪庆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规划组副组长
团员	马凯	北京市物价局局长
团员	孙方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助理
团员	杜鹰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企业研究室主任
团员	卢迈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

团 员 李剑阁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动态
组副处长级研究员

团 员 赵 明 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生产力布局
与重点建设研究室副主任

团 员 周新成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目 录

代前言 匈牙利、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

给我们的启示 高尚全 1

第一部分

主报告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报告	

	高尚全 陈一谘 王小强
	15
分报告之一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价格改革的	
	经验教训

	高 梁 马 凯
	31
分报告之二 垄断与软约束——匈牙利	
	工业企业考察

	张少杰
	58
分报告之三 不完善市场条件下的	
	国家间接控制

	赵榆江
	79
分报告之四 改革中的消费膨胀问题
	李 峻
	97
分报告之五 匈牙利住房制度的改革	
	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卢 迈 杜 鹰
	107
分报告之六 农业在全局改革中的	
	地位和作用

	卢 迈 杜 鹰
	119
分报告之七 南斯拉夫金融体系与1965年	
	以后的经济运行

	张少杰 赵榆江
	142
分报告之八 南斯拉夫对落后地区的援助	
	方式

	卢 迈 杜 鹰
	172
分报告之九 产业结构刚性：改革的共同	

难题 崔鹤鸣 赵 明 179

第二部分

中匈双边学术讨论会纪要 227

第三部分

匈牙利计划局第一副局长普洛依同志谈话纪要
(1986年5月7日) 243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同志
谈话纪要〈之一〉(1986年5月14日) 249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同志
谈话纪要〈之二〉(1986年5月16日) 257

匈牙利党中央历史研究所所长胡萨尔谈话纪要
(1985年5月15日) 263

匈牙利劳动工资局局长拉茨谈话纪要
(1986年5月19日) 267

匈牙利爱国阵线总书记伊姆莱·兰吉尔
谈话纪要(1986年5月21日) 273

匈牙利计划局第一副局长普洛依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1日) 277

匈牙利世界经济研究所伯格纳尔同志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2日) 284

匈牙利马尔雅依副总理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4日) 290

匈牙利法路维纪副总理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5日) 296

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格里格罗夫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7日)	299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沃约·拉基齐同志谈话纪要	
(1986年5月29日)	315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科学院米哈依诺维奇院士	
谈话纪要(1986年5月30日)	328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团成员洛日奇	
谈话纪要(1986年6月4日)	340

第四部分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企业撤消法	
(1986·11号)	345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企业撤消法的说明
匈牙利部长会议关于企业整顿的法令	
26/1986(VI. 16)号	378
部长会议关于处于撤消过程中的经营单位的职工的	
工作关系或会员关系的若干问题的法令	
27/1986(VI. 16)号	383
匈牙利部长会议关于延长辞退期和对安置	
予以补助的法令	
28/1986(VI. 16)号	386
匈牙利部长会议关于建立整顿基金的决议	
1043/1986(VI. 16)号	390
匈牙利部长会议关于企业撤消程序的几个问题的决议	
1044/1986(VI. 16)号	392
匈牙利部长会议关于指定监管人的决定	

1045/1986 (VII. 16) 号	393
匈牙利财政部长关于整顿组织和整顿委员会 的工作的法令	
财政部19/1986 (VII. 16) 号	394
匈牙利财政部长关于企业撤消程序费用 确定的法令	
财政部20/1986 (VII. 16) 号	400

代前言

匈牙利、南斯拉夫 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高 尚 全

1986年5月初到6月上旬，我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考察的目的是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提供借鉴经验；考察的重点是匈、南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由于匈、南两国非常重视，这次考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赵紫阳总理对这次考察很重视，在百忙中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赵总理对最近前来访问的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局局长法路韦纪说：“我们非常重视匈牙利改革的经验。不久前，我国体改委的同志到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的同志作了非常深入的介绍，谈到了成就，也谈到了困难和遇到的问题。你们的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赵总理还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它们的成功经验是主要的，它们遇到困难后得到的教训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财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经验都可以供其它国家借鉴。社

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不付一点学费是不可能的。”

（一）匈、南两国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就

首先，匈、南两国在突破产品经济旧的体制模式方面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南斯拉夫经过近四十年不间断地探索，在全面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成效。匈牙利于1968年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也全面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们首先进行了改革尝试，受到的压力也是最多的，但是进行改革的决心没有动摇。现在情况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中，东欧各国包括苏联在内也开始研究并借鉴其经验。

其次，匈、南两国通过改革，国民经济的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以南斯拉夫为例，1953～1984年社会产值（国民收入和折旧之和）以年均7.6%的高速增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67%降为1981年的19.9%；出口结构有了很大变化，深加工产品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7%上升为1984年的71%。

第三，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南斯拉夫人均国民收入由改革前的100多美元上升到现在的2800美元。匈牙利人均国民收入也由1968年开始改革时的800美元上升到3200美元。从住房看，匈牙利的人均居住面积为20多平方米，南斯拉夫1951年人均住房面积为8.7平方米，现在达到17.9平方米。从消费结构看，南斯拉夫的居民食品支出已由1952年的53.7%下降到1980年的38.3%。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总消费额中的比重在59%以

上属绝对贫困，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在40~49%之间为小康水平，在20~39%之间为富裕水平。匈牙利的居民每年人均消费肉125斤、奶292斤、蛋400斤、水果346斤，平均每两户拥有一辆小汽车，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

第四，匈、南两国市场繁荣、物品丰富。这在东欧各国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走访了很多城市，还没有看到为买东西排长队的现象。

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这是改革带来的结果。两国经过几十年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坚持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二）继续推进改革，克服面临的经济困难

从80年代以来，匈、南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1）国际收支不平衡。如南斯拉夫现有200多亿美元的外债。扎尔科维奇同志说，这主要是历届政府和地方不负责任地过多欠下了外债，而且引进的外资没有合理使用，缺乏偿还能力。（2）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扩大外延的基础上进行的。8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资金利用率下降了8~20%，重要原因是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南斯拉夫目前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60%左右。（3）通货膨胀严重。现在南斯拉夫的年通货膨胀率为80%，匈牙利为10%。居民实际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下降。（4）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南斯拉夫1985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下降为0.2%。

匈牙利、南斯拉夫面临的这些问题不能归咎于改革。正如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所说：“当前出现的经济

困难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经济决策的失误，最完美的改革方案也挽救不了决策失误”。匈另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法路韦纪说：“改革的成败，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数据，而主要看改革是否调动了集体和个人的创造力，是否实现了社会民主化。”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只有继续深入推进改革，才能克服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策尔同志在会见我们时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改革代表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未来。往前走总有些不稳定，但停下来，世界就会超越你，走到前边去。我们碰到困难时，只能往前跑，不能往后退。”

匈、南两党十三大都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和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匈牙利下一步准备采取三大改革步骤，即实行“破产法”、银行体制改革、价格补贴和税制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使计划与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南斯拉夫把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主要是资金价格过低而劳动力价格过高）、推进破产改革作为进一步改革的重点。

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人民都寄极大热情和期望于中国改革的成功。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有利条件多，如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有所提高，国内市场大，群众改革热情高，中央对改革的决心大。他们不仅介绍了改革的经验，也介绍了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目的是希望中国不走或少走弯路，因为中国的改革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很重要，而且有世界意义。

（三）改革是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要不失时机地迈出重要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项开拓性的、极其复杂、艰巨的历史使命。匈牙利的改革搞了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改革搞了四十年，虽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改革是一个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历史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仍处于计划与市场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不象”状态。有些改革属于“快变量”，如取消某些指令性计划指标、调整某些产品价格，等等；有些改革属于“慢变量”，如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干部素质的提高，等等。这些“慢变量”常常成为制约改革的重要因素。因此，改革必须有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靠短期突击，一蹴而就搞成功是不可能的。

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改革的难点在于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使计划与市场更好地结合；二是如何加强企业增加财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而不仅是增加职工收入；三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

在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同时，匈牙利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抓住有利时机迈出实质性的重要步伐，并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使改革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头。匈牙利的改革在1972年后的几年里停了下来，其外因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和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其内因主要是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80年代，当匈决定重新推进改革时，遇到了经济困难和社会承受能力的降低，改革的难

度比起当时就大得多了。他们认为，改革停下来造成的损失比改革中的某些失误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即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匈牙利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启示是：改革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又必须不失时机，在政治、经济许可的条件下迈出重要的步子，促使新体制尽快发挥主导作用；既要大胆地开拓前进，又要谨慎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四）正确处理价格、补贴、税收的关系，使宏观与微观改革结合起来

匈牙利国家对企业采取价格、补贴、税收等间接控制手段，调节机制比较周全，措施施行十分精细，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稳定。但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没有控制好，使价格、补贴、税收陷入了“百慕大三角区”。

价格不合理，就要进行补贴。1975～1976年匈较大幅度提高生产者价格后，企业生产补贴反而增加。匈补贴占预算支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28%，上升为1977年的33.3%。1979～1980年较大幅度提高消费者价格后，消费者补贴占预算支出的比例从1979年的10%上升到1982年的13%。维持这么高的补贴靠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靠抽肥补瘦，其结果是保护落后，挫伤先进，损害了企业活力和社会经济活力。形成“百慕大三角区”的原因：一是微观基础的改革没有跟上。1968年改革的重点是取消指令性计划，实现间接控制。60年代初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性企业合并，全国50个大企业，固定资产占60%，产值、利税、进出口均占60～70%。

国家小，企业少，政府领导可以直接同大企业经理电话联系，调节经济活动，国家也可以通过借款、补贴等优惠手段调节企业的产品价格、数量和出口。但是问题在于，大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企业不能破产，职工不能解雇，同时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企业转嫁成本和控制价格的能力很强。因此企业与政府就各种贷款、补贴优惠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也很强，非规范化的调节手段越来越多，目前近300种，其中23%属抽肥补瘦的收入调节。这种一户一调，一年一变的控制手段本身就弱化了市场信号的作用，弱化了市场对企业经营的压力。匈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说，企业厂长的眼睛盯着上级政府而不是市场，企业的注意力吸引到与政府的谈判上去了，增加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果不高。石油危机后，各国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但匈牙利仍对耗能高的产业进行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如资金市场、劳务市场跟不上；实行抽肥补瘦，对效益差的企业进行补贴，减少了可供社会投资的资金量，使国家想发展的产业无钱发展等。

匈牙利的“百慕大三角区”给我们的启示是，宏观管理的改革必须以微观运行方式的改革为基础。间接控制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要通过间接控制，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增强企业活力，促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改变产品结构，提高效益，增加财富。创造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与创造企业真正自负盈亏的条件不可偏废，宏观调节手段的改革同微观基础的改革结合进行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五) 搞好价格改革，防止恶性通货膨胀

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价格不理顺就影响企业的自负盈亏和市场的发展。在正确估计价格改革的作用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价格改革的条件，要警惕物价、工资轮番上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从匈、南两国的价格改革来看，一开始都有一个基础原材料、能源等相对低价，加工工业放开；消费品中必需品用补贴维持低价，其它消费品放开的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改革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一是利润刺激加工工业高速增长，加工工业空前繁荣。南斯拉夫1956～1964年加工工业发展速度为年平均13%，原材料、能源部门则只有10.7%，交通、邮电部门只有4.7%。二是消费需求旺盛，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迅速提高。三是由于加工工业所需要的技术相对简单，所需要调动的资金、劳力相对容易，投资少、见效快、资源限制小、垄断不易形成，价格放开加利润刺激无需更复杂的改革即能使供给迅速增加。但是，当改革进入到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和消费品补贴减少的阶段之后，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则增加了。其原因：一是基础工业受到资源限制大，垄断性因素强，技术要求高，资金、劳力等要素组合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价格的刺激不可能使供应迅速作出反应；二是出口受到技术和效益的双重限制；三是在第一阶段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的情况下，很难压缩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造成“比价复归”的现象，即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加工工业转嫁（或补贴）→工资增长，生产资料价格仍然偏低。这种通货膨胀，靠简单的总需求控制是很难奏效的。